

社

会

(1966-1981)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

变迁录

焦润明等 编著



沈阳出版社

SHENYANGCHUBANSHE

文

化

(1946-1987)

當代中國社會與文化



第五卷

第五卷



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焦润明 张春艳 王家会 编著
张晨怡 李相珍 陈笑迎

沈阳出版社

第二卷

(1966 ~ 1981)

1966 年

1966 年的中国笼罩着一片乌云,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年 5 月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带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之中。动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滞后影响。

1966 年初,针对由《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急剧升级的局面,由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了《二月提纲》,作为指导性文件下发到全国,以制止不断升级的全国紧张形势。在 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同时将彭真列入到“阴谋反党集团”中。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正式开始。

“文革”初期,在中国社会迅速兴起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他们就是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联,“破四旧”,所到之处,原有的秩序被彻底打乱了。红卫兵成为“文革”初期的社会舞台上股强大的、不可替代的力量。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源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作为整风运动的一种形式，后来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肯定下来，当做进行阶级斗争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这一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贴出了一张由哲学系聂元梓等人撰写的、矛头指向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紧接着，北京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上千张持反对态度的大字报，同时还出现了与聂元梓等人进行面对面辩论的场面。这样，北京大学首先出现了利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局面。

6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看到了由康生亲自送来的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后，立即给予了肯定，并批示要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中国各报发表。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大字报的全文。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的全文。聂元梓的大字报经毛泽东的批示和国家权威舆论的传播后，就等于宣布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和性质都得到了肯定。于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的有力武器和主要形式之一，迅速在全国各高校出现，继而遍及全国。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号召“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的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这实际上就很明确地提出了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的形式开展文化大革命。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在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同时,更加鲜明地肯定了大字报的形式。称赞“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并要求“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①随后,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指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②由此可以看出,在这“四大”中,大字报是基础,人们围绕大字报的内容和观点进行辩论,人们的“大鸣”“大放”又是以大字报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文革”时期,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大街小巷,人们聚集在大字报前辩论得面红耳赤的场面随处可见:人们或是真诚地给上级和同事提意见;或是借此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和私愤。这是造成“文革”初期全国混乱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组织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出现的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组织,它以“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为宗旨,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波助

①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6月7日《人民日报》。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

澜的作用。

1966年5月末,面对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附中的几位热血青年聚集在一起,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定名为“红卫兵”,意为做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后,立即得到了青年学生们的支持和响应。全国各地的高等、中等学校都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青年学生们在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将矛头直接对准本校的领导干部,将他们揪出来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后决定,向各校派工作组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将红卫兵的活动视为非法,大批红卫兵成员受到打击和处分。红卫兵们在抗争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支持。8月1日,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明确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们的革命行动。由此,红卫兵们一夜之间解除了困境,成为造反英雄。紧接着,从8月18日至11月1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达100万人次之多。从此,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英雄而扬眉吐气、不可一世,成为“文革”初期导致全国大动乱局面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个时代的青年学生生长在红旗下,真诚地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他们的心目中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将红卫兵变成了一股震撼全国的巨大力量,而在其过程中,红卫兵又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推向高峰。在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中,都大篇幅地报道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空前盛况和见到毛主席时激动幸福的心情。8月18日,“当毛泽东和红卫兵们在一起的时候,红卫兵们热血沸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两首歌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

唱了又唱”。^① 被毛泽东接见、有幸同毛主席握手的红卫兵“在和毛主席握手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们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决心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是刀山、是火海，也要闯过去。”

北京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王战胜、毛锋在与记者谈起和毛主席握手的心情时说：

当我们看到毛主席的身体是那样健康，又是那样慈祥，我们心里真比吃了蜜糖还甜，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平时我们心里有千言万语要对毛主席说，可是一见面，又不知说啥好，只是激动得流泪。我们和毛主席握手时，就像一股暖流通过全身，千句话、万句话，归结成一句话：今后一定要好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当闯将！^②

能有幸同毛主席握手的红卫兵毕竟是少数幸运者，多数人则是想办法同与毛主席握过手的人握手，以分享其幸福和温暖。红卫兵陈保红的回忆文章写道：

来自各地的革命战友，听说我和毛主席握过手，都围住我，抢着和我握手。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保红。我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旗，保卫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保卫无产阶级的

① 《毛泽东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③ 《毛泽东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革命本色,保持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

回到驻地,已很晚了。同志们看见我回来了都围住我,抢着和我握手。同学们个个心情激动,都围住我,急着和我握手。同学们个个心情激动,要我详细讲述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他们说:“太幸福了!太幸福了!”^①

毛泽东是在8月18日至11月16日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很顺利地见到毛主席的。于是,“大家坐在天安门下,金水桥边,昂首望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久久不肯离去。……更多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耐心地等待着……”^②

毛泽东的接见,化为红卫兵们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对毛泽东的盲目个人崇拜中,他们高喊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等口号,到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成为“把整个民族冲击得晕头转向的狂风暴雨”。^③随之而来的“大串联”、“破四旧”彻底将原有的秩序打乱了。

关于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毛泽东曾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说道:“这个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1、2、3、4、5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④

红卫兵运动如同涨潮和退潮一般迅速。一位美国教授这样说道:“红卫兵不过是被选择来实现毛所颁布的各种指示和教导的工

① 《用毛主席握过的手,天天捧读毛主席著作》,196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② 《在五十里红色大道上》,196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③ 《在五十里红色大道上》,196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④ 徐祝庆 陈小川《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八一八”的历史反思》,1986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具。”^①的确,伴随着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彻底打垮,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历史使命便结束了。从1968年春季开始,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声中,红卫兵被迅速地剔除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反修防修”的指示指引下,先后有1700多万青年学生离开故乡,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农村和最艰苦的地方,开始了知青生涯。

遇罗克与《出身论》

遇罗克生于1942年,家庭出身资本家,因撰写《出身论》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年仅27岁。

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划分了阶级成分,以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标准,在农村把所有家庭分别划定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成分;在城市则把所有家庭分别划定为资本家、工人、贫农等成分。虽然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论”,但事实上,被划定为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后来的坏分子、右派分子等都毫无例外地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视为敌对分子和专政的对象,其家属和子女也都受到株连和歧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各单位的重要领导多数都被以“黑帮”论处,相当数量居于高级领导职位的老干部受到冲击,这使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无法理解和接受,他们反对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造反。在力求自保而完全没有别的武器的情况下,“血统论”就被作为自保的武器而被抬了出来。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中的干部子

^① 转引自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

女,在校园里贴出了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是鼓吹“血统论”的典型之作。随后,他们把对联贴到了北京的主要高等院校。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凡是校园内出现这类对联的地方,立即出现了赞成与反对两派的激烈辩论。8月6日,赞成这幅对联的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从此使“血统论”的观点得到广泛宣传。此后,很多学校开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审查红卫兵资格,使红卫兵组织成为一种带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各个学校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师生开始受到红卫兵的歧视、凌辱乃至殴打,有些非“红五类”还成为被红卫兵“专政”的对象。

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兴起,作为红卫兵运动指导思想的“血统论”,又被迅速传播到社会上,家庭出身成为一切社会生活的首要标准。当时,乘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要报出身,进商店、住旅店要报出身,甚至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所当然地被拒之门外,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出来的。

遇罗克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喜爱读书,善于思考,是一个深得人们喜爱的好学生。1959年,他的父母双双被划成右派,从此,他饱尝了家庭出身给他带来的种种苦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罗克目睹了在极“左”思潮的驱动下所带来的种种灾难,在日记中写下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面对“血统论”的泛滥,遇罗克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眼前的社会现实,他从和自己情况类似的很多人的不幸经历中,意识到“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以致使“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惟出身论的深渊之中”。他认为:“面对这样严重的

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①

1966年12月,由遇罗克撰写,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材料《出身论》在北京的许多公共场所张贴出来,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人们争相阅读、抄录,更多的人读过之后在思索。在“血统论”甚嚣尘上、压抑了无数有为的青年、残害了无数无罪的生命的时候,《出身论》道出了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人们争相传抄、翻印,影响迅速波及全国。1967年1月28日,全文刊载《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公开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了3万份的小报被一抢而空,接着又重印了6万份,也被一抢而空。

“《中学文革报》在创刊的第二天,就在社会上激起了极大的反响……虽只在北京发行,但从全国收到的读者来信迅速地达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自己去邮局取邮件,平均每天的来信就有几千封,……我们在每一期出版之后,仅仅在市场上销出半数,另外半数留下以外地邮购和来联络来访的人”,卖报时的盛况更是空前绝后:“三轮车被围得层层不穷,无数的伸过来,我的手向前一伸,便被塞满大把的钞票,拿起报纸一送,便不知被谁扯去,根本说不上找钱。”^②“街上的人只要一听说是《中学文革报》,便蜂拥来抢购。许多人惟恐买不到,便不按秩序排队,人人伸手递钱,那情景真是难以形容。有一次罗勉去卖报,人们立即排了一长队,可是,少数人不守秩序,队形乱了起来。罗勉一生气,抱起报纸就跑,想躲到一个清静些的地方重新卖。一回头,一长队的人跟着他跑……当时小报是二分一份,可是在换报纸

① 遇罗锦:《出身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第5页。

② 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第223页。

的黑市上竟须用二十五份其他小报才勉强换来一份《中学文革报》”^①

《出身论》之所以在当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它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倾向。

《出身论》指出:“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②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③1968年初,遇罗克被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而被逮捕。经过多次批斗、公审,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被判处死刑。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平反昭雪,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破四旧”狂潮

“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是红卫

① 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第345页。

② ③遇罗锦:《出身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第6-8页。

兵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中国社会是一场剧烈的震荡和洗涤,为“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证。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破“四旧”的号召。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再一次提出。8月18日,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号召红卫兵小将们立即行动起来,坚决破除“四旧”。从这一天起,红卫兵开始了举世震惊的激烈行动。

破“四旧”首先从改名开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所有的商店、街道、工厂、学校、公社以至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红彤彤的革命名字。在改名的过程中,许多独具特色的老字号被冠上了革命的名字。如全聚德烤鸭店:

8月19日晚,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臭味十足的“全聚德”招牌被革命职工砸了个稀巴烂,换上了新招牌“北京烤鸭店”。

红卫兵点起的这把火,烧毁的不仅是一块招牌而是整个全聚德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闯将,走遍了全聚德的餐厅、厨房、宿舍。在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全聚德的大小餐厅,挂的都是山水草木之类的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旧风俗束缚着全聚德。

.....

红卫兵到新华书店给北京烤鸭店订购了一百幅毛主席画像,……一夜之间从橱窗到餐厅,从厨房到宿舍,通通挂上了毛主席画像和数以百计的毛主席语录。外国餐厅的楼梯口上,原来挂的是一幅画着北京鸭的大画,现在是一条金色大字的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①

除了像“全聚德”这样的老字号被改名外,很多街道也都被改了名称。如原来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等等。

在上海,红卫兵们也组织起来,向“四旧”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橱窗上,红卫兵和这个商店的职工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他们指出:“永安”是旧社会大老板企图永远安安稳稳剥削劳动人民而定的,有了资产阶级的“永安”,就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今天,商店虽然早已成了人民的商店,但我们决不允许“永安”这个臭招牌继续挂下去!有的建议改为“永红”、“永斗”,有的建议改为“东方红”,有的建议改为“红卫”。

具有五十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在人们欢呼声中,职工们和红卫兵一起,拉下了几米高的“大世界”这块招牌。……在旧社会,就在这块招牌下面,不知腐蚀了多少人的灵魂。今天,“大世界”成了劳动人民的娱乐场所。但是人民群众厌恶这个名称。……

上海《新民晚报》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建议,从今天起改名为《上海晚报》。^②……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也都积极行动起来,形成了一

① 《红卫兵在“全聚德”点起了革命烈火》,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② 《上海革命小将上街造反》,1966年8月24日《文汇报》。

场风靡全国的改名运动。在合肥：

革命小将们将“包公祠堂”改为“阅览室”，“包和公园”改为“人民公园”，……他们决心打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用以麻醉人民的臭名字、烂招牌。昨日，红卫兵们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把“包河浴池”、“胡开文笔墨店”、“陶广盛菜馆”、“刘鸿盛饺面馆”和“张顺兴糕点门市部”分别改为“人民浴池”、“工农兵笔墨店”、“回民饭店”、“人民饭店”和“立新糕点门市部”。同时，提倡把崇古复古、充满封建意识的“四新巷”、“三孝口”、“回龙桥”、“庙街”和“四牌楼”，分别改为“四古巷”、“红路口”、“立新桥”、“红街”、和“东风广场”。……使合肥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处处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①

在上海、在广州、在长沙……在全国各地，经过红卫兵猛烈地冲击，凡带有旧色彩的名称都换上了阶级立场鲜明、红彤彤的名字。

改名的同时，人们的装束也作为破“四旧”的内容而必须改变。长头发、长辫子、烫过的头发、小裤腿管，漂亮的裙子、尖头皮鞋等都被视为“四旧”而被清除。

上海红卫兵们还组织了破“四旧”的“宣传队”，有一个学校的宣传队昨天下午跑进了许多有名的服装店、皮鞋店、理发店和照相馆。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作行动指南，每到一店就宣传奇装异服、尖头皮鞋败坏了新社会的风气，各店的职工们表示“奇装异服、港式皮鞋，过去已停止

① 《合肥“红卫兵”向旧风俗习惯发起猛攻》，1966年8月24日《安徽日报》。